

117
C46

山东省教育科学“九五”规划重点课题研究成果

ERSHISHIJI ZHONGGUO YUWENJIAOXUE
20世纪中国语文教学

陈黎明 林化君 著

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
青 岛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世纪中国语文教学 / 陈黎明, 林化君著. — 青岛: 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 2002. 7

ISBN 7-81067-326-2

I . 2 … II . ① 陈… ② 林… III . 汉语 - 语言教学 - 中国
- 20世纪 IV . H19-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26338 号

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青岛市鱼山路 5 号 邮政编码: 266003)

出版人: 李学伦

日照日报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 经销

开本: 850mm×1168mm 1/32 印张: 17 字数: 400 千字

2002 年 7 月第 1 版 200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 000 定价: 29.80 元

序

李杏保

浩瀚汪洋，无际无涯，船舰冲浪驰骋；苍茫云海，无边无垠，飞舟凌空翱翔。驾驶员并未始终观察、比照眼前的实物，也不直视——其实也根本不可能直接观望既定的航行目标，而是密切注视罗盘上的坐标，参照实际航行中的一定制约因素，来厘定和不时调整航向、航速，控制使用动力能源，把握节奏行止，最终准确无误地到达目的地。

在语文教育研究的蓝天大海中，陈黎明、林化君两位先生，正是这样的驾驶能手。新千年伊始，他们合作主编了《汉语应用语言学》，从语用学的角度切入了中学语文教学研究领域；正当我国语文教育迫近独立设科 100 周年之际，他们又撰写了《20 世纪中国语文教学》，力图从语文史和教育

史的视野,交互鸟瞰语文学科教育的发展轨迹。这样,他们就在“语文教育研究罗盘”的“坐标”上,纵横捭阖地拓开了语文教育研究的“巡航图”。

两位先生率直地把研究的界限实事求是地定位在“语文教学”上,我甚表赞赏。

教育研究是科学,科学研究的成果必须准确地运用科学的范畴与概念,必须有的放矢地为现实的教育实践服务。迄今为止,高等师范院校所培养的学生,主要是在毕业后去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学第一线担任合格教师的。尽管我们教育科学的现代化进程在日益加速,然而课堂教学的主阵地决不会因此而轻易地退出历史舞台。尤其是身负母语教育重任的语文课堂教学,更不会因为它在各种人为因素干扰下出现了一些失误,就会被某些缺乏历史思考的学者以“误尽苍生”之罪名,打进永无出头之日的“冷宫”。

1878年,恩格斯在他的《反杜林论》中严厉地批判了杜林的“现存学校无用论”和“语文学科取消论”。杜林在他的改良主义教育蓝图中,勾画了他的“未来学校”。在那里,“要给儿童的知识是不需要特别的劳动和紧张的努力就能领会的”,而希望获得的这种结果,“不是通过各门学科的系统学习,而是通过对各门科学综合起来的混合物的学习得来的”。杜林“取消了学校里的语文教育,废除了语言的历史发展的研究,只局限于一种形式的语法”。毋庸讳言,在现今的语文教坛,仍不时出现貌似权威的“杜林阴影”,致使第一线教师在课堂教学中无所适从。从语文学科教学发展的历史梳理中引出镜鉴,正本清源,廓清迷茫与混沌,这应该是当务之急。

从20世纪80年代起,我国高等师范院校的“中学语文教材教法”,已然“连升三级”,经历了“语文教学法”、“语文教学论”几乎是原地踏步式的“两级跳”,后来又稍微在原有的内容中兑了点“汤汁”,便纷纷冠名“语文学科教育学”,“三级跳”式地完成了所谓崭新的学科体系建设。事实上,新的研究范畴未见有多少拓展,新的学术概念尚未科学地形成或被普遍地认同,用句挖苦的话来说,一些急就章式“换汤不换药”的语文教育理论,多半是增添了形形色色、洋洋洋味、故弄玄虚的“口服液”之类,而缺乏人体亟须的一系

列原生态的维生素、粗纤维，真个是“口惠而实不至”。其实，教学与教育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正如赫尔巴特早就说过的：“我想不到有任何‘无教学的教育’，正如在相反方面，我不承认有任何‘无教育的教学’。”我认为，这部专著的定名，正反映了两位先生从教学实际出发、以指导教学实践为归宿、不屑于名不副实的泡沫学术的科研胆识。正当大批教师在感喟“越来越不会上语文课”的困惑之际，奉献一系列研究“语文教学”的成果，不啻是雪中送炭的明智之举；而在全方位、高层次的语文教育理论研究中，对其主阵地“语文教学”进行一些填补空白的有深度的探讨，仍不失为锦上添花的工作。

这部专著采用了各章要件大致相当的平行结构，眉目清晰，层次井然，篇幅适宜，十分有利于教学。我特别注意到每章各有一节“××时期的语文进步”，这显然是语文史向语文学科教学史的融合与渗透。我知道，黎明老弟在这方面有相当深厚的根基。他曾在语言学研究堪称全国一流的复旦大学攻读研究生，他的导师濮之珍教授是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中外语言理论史专家，是我国著名美学大师蒋孔阳教授最亲密的贤内助和语言翻译方面的“高参”。我在上世纪 50 年代中后期有幸聆听濮教授的“语言学概论”课程，后来又与濮教授的长兄、在安徽师大任教语文教学法课程的濮之琦教授有过交往。我深知，濮之珍教授严谨治学的学术风范，一定会在黎明老弟身上得以传承与发扬。我与顾黄初教授合著《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史》时，虽曾关注过语文史的梳理，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我们那部著作对这方面的陈述依然显得相当薄弱。2000 年赴香港参加国际语文教育研讨会时，我进一步意识到，每一时期的语文进步，对语文教育的革新，直接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针对当时一些学者过于张扬人文性、大肆挞伐其实已经蕴涵了以人为本精神的工具性的偏向，我以《语文工具革命与语文教育创新》为题，着重阐述了如下观点：

语文工具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最基本的生存与发展的手段。每一个历史时期都需要、也必然会引起不同程度的语文工

具革命。在20世纪前期，语文作为认识世界、表现自我、了解他人、相互交流的思想工具，已经发生了诸如“白话文”、“新式标点”、“语法与修辞”、“硬笔书法”等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变革，随之带来了语文教学的加速发展；在20世纪后期，语文教育大面积获取显著成就，主要反映于凭依汉语拼音方案等语文工具革命性的普及，从而使全国青少年普通话水平空前提高，全国幼儿识字教育成绩令人瞩目，有些实验学校甚至利用双音双拼等技术，大幅度地提高了学生的电脑读写水平，即使进行必要的人文教育或文学教育，也不应该忌讳语文工具革命的成果——电脑荧屏教学、多媒体教学以及语音实验室教学等等。

.....

新世纪的语文工具，无论是语言文字自身作为工具，还是在使用语言文字过程中所采用的工具都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文明的进步，正在发生或酝酿着革命性的变化。近年来某些人士批评的“科学主义”，不可读作“科学性”的同义语，语文教学的理论与实践中，远不是“科学性”过了头。与日俱臻的语文教学创新，正期待、呼唤和催进语文工具的科学性革命！

我由衷地感佩两位先生在语文教育史的研究范畴中，及时而扎实地引入了语文史的源头活水。这不仅使每一个时期语文教学的突破与革新，获得了明晰阐释的内在依据，更重要的是，我们在今天和明天构建有中国特色的语文教学体系时，就可以在瞻顾语文史与教育史的轨迹中，细察并把握语文教学史的发展规律，制订与时俱进的改革方案与实施细则，从而切实而有效地大面积提高语文教学质量。这正是我们语文教育理论研究工作者应有的襟怀和抱负。

当然，在语文教学史的分期阐述中，在引进语言学的一些术语概念中，特别是在“余言”的一些展望性引述中，不免会有若干“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之处，这些都是正常的。不过，作为一部历史记

录的著作，编著者的自身观点不宜显豁，尤其不宜像我这篇序言中某些观点流露时所表现出的明显倾向性。要养成令人钦羡的学术“火候”，我作为年逾花甲的一员“老兵”，深感相差甚远；陈、林两位先生是我们语文教学法同行中的“少壮派”、“生力军”，还将长期在“老君炉”中修炼，他们必将迎来在学术上炉火纯青的美好前程。

同门，同行，同好，同志，乐为之序！

于壬午年正月初五海上秀枫园宁人居

目 录

序 李杏保

引 言

第一章 语文学的阐释	1
第一节 语文学的内涵.....	2
第二节 语文学科名称的嬗变.....	5
第三节 20世纪中国语文学的历史分期	13

上 编

第二章 中国现代语文学的兴起时期

——语文学单独设科(1901~1910)

第一节 清末新政时期的社会教育形势	16
第二节 清末新政时期的语文学进步	22
第三节 中国现代语文学的兴起	30
第四节 清末新政时期的语文学教科书	34
第五节 清末新政时期的语文学教学方法	41

第三章 中国现代语文学体系的形成时期

——国语、国文课程标准纲要的制定(1911~1926) ... 45

第一节 五四运动前后的社会教育形势	45
-------------------------	----

第二节	五四运动前后的语文进步	60
第三节	五四运动前后的语文教学研究	66
第四节	五四运动前后的语文教学改革与实验	80
第五节	国语、国文课程标准纲要的制定	89
第六节	五四运动前后的语文教科书编制	97
第七节	五四运动前后的语文教学方法探索	101
第四章 中国现代语文教学的持续发展时期		
——国语、国文课程标准的颁布与修正(1927~1949)		117
第一节	抗战前后的社会教育形势	118
第二节	抗战前后的语文进步	129
第三节	抗战前后的语文教学研究	144
第四节	国语、国文课程标准的颁布与修正	159
第五节	抗战前后语文教科书的编写	169
第六节	解放区的语文教学	179

下 编

第五章 中国当代语文教学的新生时期		
——“语文”学科名称的确立(1949~1957)		199
第一节	建国初期的社会教育形势	200
第二节	建国初期的语文进步	204
第三节	建国初期的语文教学研究	222
第四节	建国初期的语文教学大纲	234
第五节	建国初期的语文教材	254
第六节	语文教学方法与教学改革的特点	261
第六章 中国当代语文教学的曲折探索时期		
——被“革命”的语文教学(1958~1976)		267
第一节	教育革命前后的社会教育形势	267
第二节	教育革命前后的语文进步	280

第三节 教育革命前后的语文教学研究与改革实验	292
第四节 教育革命前后的语文教学大纲	308
第五节 教育革命前后的语文教材	316
第六节 教育革命前后的语文教学方法	327
第七节 教育革命前后语文教学改革的特点	333
第七章 中国当代语文教学的改革发展时期	
——“多纲多本”的语文教学(1977~2000)	340
第一节 新时期的社会教育形势	340
第二节 新时期的语文进步	354
第三节 新时期的语文教学研究	373
第四节 新时期的语文教学改革实验	392
第五节 新时期的语文教学大纲	413
第六节 新时期的语文教材	438
第七节 新时期语文教学改革的特点	462
余 言	
第八章 面向 21 世纪的中国语文教学	
——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的制定(2001~)	470
第一节 21 世纪初的社会教育形势	470
第二节 世纪之交的语文教育大讨论	478
第三节 国际课程改革的趋势	491
第四节 我国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的制定	502
第五节 “言语”视角中的语文教学观	508
参考文献	524
后 记	527

引言

第一章 语文的阐释

中国语文教育的历史源远流长，仅从可供考证的殷商甲骨文算起已有 3000 余年的历史。但是古代的语文教育是汇经、史、哲于一体，熔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于一炉，集伦理道德、文化知识甚至自然常识等教育于一身的“大语文”教育体系。中国具有现代意义的“语文”教育学科，即把语文教育列为独立的学科，始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现有的资料表明：民间独立设置语文教育学科，始于光绪四年（1878 年）张焕纶在上海创办的正蒙书院；政府独立设置语文教育学科，始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 年）清政府颁布的《钦定学堂章程》；政府正式设置并在全国推行语文教育学科，则始于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底（1904 年元月）的《奏定学堂章程》。

20 世纪中国现代的语文教育教学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为了全面总结 20 世纪中国语文教育教学所走过的路程，并在此基础上探讨 21 世纪中国语文教育教学的发展，我们主要以学校语文教育为主线，从社会教育形势、语文进步、语文课程标准的制定、语文教材的编写、语文教学方法的改革、语文教学研究和改革实验等方面，作比较全面的研讨。

为了更好地把握20世纪中国现代语文教育教学理论的发展，我们首先了解一下语文的内涵及语文学科名称的由来。

第一节 语文的内涵

对“语文”一词，人们的认识很不一致。王力先生曾经指出：“现在语文这个名称很多地方的用法都不一样，比方说各地都有语文学会，有些语文学会就是语言文字学会，有些地方就是语言文学学会”。^①这些不同的解释，分别出现在有关的工具书和著名学者的有关论著之中。

《现代汉语词典》对“语文”的解释是：“① 语言和文字；～程度（指阅读、写作等能力）。② 语言和文学；中学～课本。”《辞海》没有列出“语文”词条，但有“语文学”条目，并解释为：偏重从文献角度研究语言文字的学科的总称……包括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校勘学等。现在往往将语文学包括在语言学内。广义的语文学也包括语言和文化研究。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辞海》实际上是将“语文”解释为“语言文字”的。

著名学者对“语文”的解释，我们首先看一下语文教育界的“三老”的认识。叶圣陶先生在《认真学习语文》一文中指出：“什么叫语文？平常说的话叫口头语言，写到纸面上叫书面语言。语就是口头语言，文就是书面语言。把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连在一起说，就叫语文。”^②吕叔湘先生在《关于中学语文教学的种种问题》一文中指出：“‘语文’这个词本身的意思就不清楚。可以解释是语言和文字，

① 《王力论语文教育》，河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79页。

② 《叶圣陶教育文集》，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83页。

也可以解释是语言和文学。”^① 张志公先生在《传统语文教育教材论》一书中指出：“语文这门学问主要是语言文字之学。”^②

不仅语文教育界的三老对“语文”的解释不尽一致，同一学者在不同场合对“语文”的解说也不尽一致。如著名语言学家、语文教育家王力先生在《中学语文教材改革第三次座谈会上的发言》中指出：“我们这语文课到底是语言文字还是语言文学呢？好像多数人的了解应是语言文学。可是照我的理解，应该是语言文字。”^③但在《漫谈中学的语文教学》一文中却又指出：“‘语文’这个词有两种意义：一个是‘语言文字’，另一个是‘语言文学’。我想中学的语文课大概是指的‘语言文学’。1956年中学语文分科，就分为‘汉语’和‘文学’。”^④

近几年来，我国语文教育界又出现了对语文“工具性”、“人文性”的激烈论争，其实质是对“语文”属性的理解各执一端。“工具性”论者强调了语文是思维的工具、交际的工具，或者说是传递信息的工具。“人文性”论者，重视文化熏陶，强调进行审美教育，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1996年国家颁布的《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课程计划》（试用）和《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供试验用）指出：“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也是最重要的文化载体。”也就是说，语文具有“工具性”的特点，也具有“人文性”的特点。实际上，这也是从“语言文字”的角度来认识语文的内涵的。其实，将两方面的看法融合起来，恰恰能够体现汉语文的本质特点，正如2000年国家教育部颁布的《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试验修订版）所指出的：“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

① 《吕叔湘论语文教学》，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44页。

② 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49页。

③ 《王力论语文教育》，河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79页。

④ 同上，第289页。

的重要组成部分。”

令人感兴趣的是，在我国，对“语文”的最初理解，既不是“语言文字”，也不是“语言文学”，而是“语言文章”。1902年，清政府《钦定学堂章程》设“词章”科，大致相当现今之“语文”。1904年，清政府《奏定学堂章程》改“词章”为“中国文学”科。1912年，中华民国教育部改“中国文学”科为“国文”科。1921年，教育部改小学“国文”科为“国语”科，中学仍为“国文”科。1949年8月，作为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主任委员的叶圣陶先生起草课程标准，开始在初中、高中使用“语文”这个学科名称。当时初、高中语文教科书的编者（包括宋云彬、朱文叔、蒋仲仁和周祖漠、游国恩、魏建功等）在课本“编辑大意”中说：“说出来是语言，写出来是文章，文章依据语言，‘语’和‘文’是分不开的。语文教学应该包括听话、说话、阅读、写作四项。因此，这套课本不再用‘国文’或‘国语’的旧名称，改称‘语文课本’。”^①

实际上，作为一个学科的“语文”，既不等于“语言文字”，也不等于“语言文学”，同样也不等于“语言文章”；“语文”的内涵比它们都更加宽泛丰富，只不过是在不同的学业阶段各有所侧重而已。总的说来，“语文”是一个以语言为核心的包括语言、文字、文章、文学及相应文化等在内的言语学科体系，是口头言语与书面言语的统一体。大致说来，在小学阶段，语文侧重于“语言文字”；在中学阶段，语文侧重于“语言文章”；在大学阶段，语文侧重于“语言文学”。不管是“语言文字”、“语言文章”、“语言文学”，还是“口头言语”与“书面言语”，它们必须通过听、说、读、写、思的言语活动才能得到更好的了解、领悟与运用，因此听、说、读、写、思等方面的“言语”能力的提高构成语文学科教育教学的目标。

^① 转引自庄文中《语文的性质和语文学科的地位、教学目的》，《语言文字应用》1996年第1期，第33页。

第二节 语文学科名称的嬗变

一般意义上的语文教育,即培养青少年听、说、读、写能力的教育,在人类社会的初民时期就已经存在了,至今至少有几千年的历史。因为人类自从有了语言以后,就自然地有了“听说”教育的问题;有了文字以后,也就自然地有了“读写”教育的问题。然而,在我国,“语文”作为学校教育中的一个独立的学科,一门有自己独特的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的课程,却是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才开始出现的。

据古籍记载,远在尧舜时期就出现了学校的萌芽。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奴隶制发展阶段出现了奴隶主贵族的宫廷学校。春秋战国时期,又出现了私塾。以后 2000 多年封建社会的教育,则是宫廷学校(官学)和私塾的继续与发展。殷周时期,已有一套比较完备的学校教育系统。“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比年入学,中年考校。”(《学记》)学制分为“小学”、“大学”两段。“八岁入小学,学六甲、五方、书计之事,始知室家长幼之节;十五入大学,学先圣礼乐,而知朝廷君臣之礼。”(《汉书·食货志》)秦汉以来,学校体制造有变更,但仍只有“小学”、“大学”二段制教育,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清末。在封建社会,儒家经典是各类学校教育的基本内容,语文教学则完全是为封建统治服务的科举考试的附庸。

清末,多称学校为“学堂”。到了同治年间(1862~1874 年),虽然学堂很多,却把学校教育改为一段制,既无预备学校,又无继续研究的机关。新式学堂借鉴西方经验,实行分科教学,语文教育也逐步从传统教育中分化出来,成为与修身、算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等并列的独立学科。其中,1878 年(光绪四年)张焕纶在上海

县梅溪街创办的正蒙书院，最早设国文科，以“俗话译文言”、“讲解与记忆并重”为特色。^①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后，又主张两段制教育，分学校为“头等学堂”（大学），“二等学堂”（小学）。其后，受西方近代教育体制的影响，提出了实施三段制教育的主张。

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上海南洋公学在外院（附属小学）之上，开办上、中两院，大致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谓的“小学”、“中学”和“大学”。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的《京师大学堂章程》，也分学校为三段，称作“大学堂”、“中学堂”、“小学堂”。清政府在1898年搞“戊戌变法”，命各省、州、县、府开设中西学堂。当年五月，清政府在所颁布的《清帝谕各省府厅州县改书院设学校》中称：“将各省府厅州县现有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之学校，至于学校等级，自应以省会之大书院为高等学，郡城之书院为中等学，州县之书院为小学，皆颁给《京师大学堂章程》，令其仿照办理。”^② 自此以后，我国初等、中等和高等三段教育的制度逐渐完备，而读儒家经典，写八股文，仍是此时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语文课程的基本内容。

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清政府取法日本的学制，颁布了我国教育史上第一个较为完整、系统的新教育制度——《钦定学堂章程》，史称“壬寅学制”。这个学制规定，蒙学堂（相当于初级小学）设“字课”、“习字”和“读经”等与语文教育相关的课程；寻常小学堂（相当于高级小学）设“读经”、“作文”、“习字”等与语文教育相关的课程；高等小学堂（相当于初级中学）设“读经”、“读古文词”、“习字”和“作文”等与语文教育相关的课程；中等学堂（相当于高级中学）设“读经”、“词章”等与语文教育相关的课程。这些课程，可以说

^① 徐林祥《中国现代语文教育的历史回顾》，《中学语文教学参考》1999年第8～9期。

^② 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版，第82页。

是“语文”学科的雏形。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个学制并没有实行。

1904年元月(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底)，清政府又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这是我国第一个经政府正式颁布而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的学制，史称“癸卯学制”。这个学制规定，在初等小学设“读经讲经”、“中国文字”等与语文教育有关的课程；在高等小学和中学则设“读经讲经”、“中国文学”科。这可看做是“语文”单独设科的正式开端。^①

清政府的“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都非常强调“读经讲经”，这是因为“中国之经书，即是中国之宗教。若学堂不读经书，则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所谓三纲五常者尽行废绝，中国必不能立国矣”。“无论学生将来所执何业，在学堂时经书必宜诵读讲解。”^②说到底，是为了向学生灌输封建的伦理道德观念，使学生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所谓“忠臣”、“顺民”，以维护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在“读经讲经”之外，把有关语文教育的学科名称定为“字课”、“习字”、“读古文词”、“作文”、“词章”、“中国文字”和“中国文学”，这是“语文”学科由传统向现代过渡时期的特殊现象。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清政府下谕“立停科举以广学堂”，在中国实行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至此被完全废止。在此前前后后，各级各类新学堂在各地纷纷设立，并且在这些学堂里开设了一些不同于昔日的课程，其中就有类似于今天的“语文”课，只是名称还不叫“语文”罢了。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清政府颁布了《学部奏定女子学堂章程》，规定女子学堂所设9门学科中就有一门是“国文”；并且规定：开设“国文”课，“其要旨在使知普通言语日用必需之文字，能行文自达其意，且启发其智慧”。同时规定了在初小和高小教学的不同程度要求：“其教课程度，在女子初等小学堂，

^① 曹洪顺《“语文”单独设科》，《语文教学通讯》2000年第1期。

^② 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版，第200页。